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檀香刑》英译本的创造性叛逆研究

田 容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6日

摘 要

本研究以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为理论框架, 聚焦葛浩文《檀香刑》英译本, 分析译者如何在语言、文化与交际维度进行创造性叛逆。研究发现,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基于目标语生态的理性策略: 语言维通过词汇简化与句法重构弥合汉英差异; 文化维以个性化翻译完成方言与文化意象的转换; 交际维则依托前两者的转换, 重构了原文的语用等效与人物情感, 三者协同实现译文在目标语生态中的有效存活。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中权衡文化传递、读者接受与交际效果后的必然选择, 具有正当性与建设性, 为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合理性提供生态翻译学视角阐释, 也为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三维转换, 《檀香刑》, 葛浩文, 创造性叛逆

A Study on the Creative Treas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andalwood De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s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Rong T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1, 2026; accepted: July 6, 2026; published: July 16, 2026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Eco-translatology, this study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Howard Goldblat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 Yan’s *Sandalwood Death*,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mechanisms of creative treason enacted across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uch treason constitutes a set of rational adaptive strategies calibrated to the target-language ecosystem: the linguistic dimension mitigates structural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rough lexical simplification and syntactic reconstructio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facilitates the transmutation of dialectal and imagistic elements via personaliz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communicative dimension, predicated upon the former two, reconstructs pragmatic equivalence and characterization. Operating synergistically, these dimensions ensure the text’s viability and survival within the target ecological context. The study posits that creative treason represent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translator’s negotiation amo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reader reception, and communicative efficacy within a specific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thereby affirming its legitimacy and constructiveness. Ultimately, this research offers an Eco-transl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ationale behind creative treas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global contexts.

Keywords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Sandalwood Death*, Howard Goldblatt, Creative Trea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而文学翻译作为跨语际、跨文化的复杂实践，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译者基于目标语生态环境进行适应性选择与创造性调适的过程。生态翻译学提出的“三维转换”理论，为系统分析译者的翻译行为提供了理论框架，其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出发，探讨译者如何通过适应性选择实现译文在目标语语境中的存活与新生，也为分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以清末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叙事为载体，文本中交织着地方戏曲、民俗文化、市井语言与时代语境，文化元素密集、语言风格极具张力，这些文本特质使得其英译面临着诸多转换难题。葛浩文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核心译者，其《檀香刑》英译本在海外获得广泛传播与接受，译本中译者为适配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与阅读习惯，对原文进行了多维度的调整与重构，这些翻译实践恰好构成了探究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创造性叛逆的典型样本。

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学界对其作品的海外译介与传播给予了高度关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研究，传播与接受研究以及译者行为研究。王小花[1]以目的论视角研究莫言小说英译策略，认为以目的论为指导，采用直译、意译、省译、合译等翻译策略，能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从而达到更好的交际目的。杨四平[2]研究莫言小说海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建构，认为莫言小说海外传播和接受中的中国形象建构，是观察中国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传播与变异的重要样本。此外，黄苗、刘川

鄂[3]以读者意识为理论,研究葛浩文翻译莫言小说方言的实践,认为方言翻译应树立和强化读者意识,允许在不损伤原作整体结构、思想内涵与独特风格的前提下进行适度调整和改写。作为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实践一直是翻译界研究的焦点。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其“连译带改”“创造性叛逆”等翻译策略,肯定了其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吕世生,郭庆[4]从解构主义“生命欲望”理论出发,试图为葛浩文的翻译偏离寻求新的理论解释;胡作友,彭九州[5]则从翻译伦理与读者接受的视角,分析葛浩文的删改动因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学界对葛浩文的改写式译介实践也存在诸多争议。单伟龙、陈保红在分析其多重译者身份与翻译行为的关联时,既肯定了其作为“文化摆渡人”推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价值,也指出其翻译存在译者主体性过度、原作文化内涵与文学风格弱化的问题,引发了关于翻译忠实性与跨文化传播平衡的辩证讨论[6]。

尽管现有研究对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及莫言作品的英译研究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从理论视角来看,以往研究多集中于目的论、读者意识等单一维度,较少有学者进行理论的融合研究。其次,在研究深度上,现有成果多停留于宏观的策略归纳或文化意象的静态对比,缺乏对译者“创造性叛逆”行为的动态剖析——即译者在面对高密方言、民间戏曲等异质文化时,如何在语言、文化与交际三个维度上进行即时的“适应与选择”,这一动态机制仍有待深入挖掘。

针对上述局限,本研究以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为理论框架,分析《檀香刑》英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翻译策略归类,而是重点探究译者葛浩文如何通过多维度的“创造性叛逆”实现译文在目标语生态中的存活与新生,以期为中国文学英译实践提供参考,助力中国地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与译介研究。

2. 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是21世纪初由胡庚申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翻译理论,以生态整体主义与东方生态智慧为理论基石,系统探究翻译生态的平衡与和谐[7]。该理论依托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为哲学根基,将翻译活动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做出选择性决策的动态过程,强调原文、原语、译语等翻译各要素相互协调,以此维系翻译生态的动态平衡,构建和谐统一的翻译语境。

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历经了从理论框架建构到多维度应用拓展的发展历程,研究范畴不仅覆盖文学、影视、外宣翻译领域,也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及专业期刊逐步走向国际学界。文学翻译层面,学界多聚焦经典作品重译与文化负载词的跨语际转换研究。陈延潼[8]以余光中《梵谷传》和《老人与海》重译为个案,阐释译本如何依托译者适应性选择,在全新翻译生态环境中实现文本生命力的延续;周韦、宋彬彬[9]以《儒林外史》为研究对象,探析译者在语言维度与文化维度之间的动态平衡翻译策略。在实用文本与外宣翻译领域,相关研究紧密贴合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王静[10]以黄河纪录片《黄河安澜》为研究载体,提出生态文化国际传播的三维适应性翻译策略;杨春丽、胡庚申[11]探究了旅游外宣文本的翻译优化路径,助力地方国际形象建构;王畅、杨玉晨[12]从微观视角梳理中医医院公示语英译原则,搭建起协调稳定的翻译生态系统。此外,在翻译教学领域,何思颖[13]将生态翻译学引入皮革专业英语翻译课堂,提出契合行业标准的教学优化路径。

经过学界持续深耕与拓展,生态翻译学已发展为涵盖“适应与选择”“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三维转换”“四生理论”等核心概念的成熟翻译理论。其中,三维转换作为理论最具阐释力的方法论核心,可为翻译实践提供明确的操作路径与分析依据。该理论主张译者需从三个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语言维侧重语言形式的适配转换,文化维注重文化内涵的传递与诠释,交际维着眼双语交际意图的有效实现,三者共同构成翻译质量评析的核心标准。因此,作为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方法论,“三维转换”能够为本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3. “创造性叛逆”概述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14]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系统提出。他从跨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出发,敏锐地指出由于时代、民族、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读者意图与作者意图往往存在难以弥合的距离,继而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一定义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语言转换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文形态的改变,构成某种程度上的“叛逆”;另一方面,这种跨越时空的移植又赋予了作品崭新的生命力与审美价值,体现了“创造”的本质。

在我国,该概念经由谢天振教授的系统引进与深耕而实现了理论本土化。在其里程碑式著作《译介学》[15]中,谢天振不仅确立了“创造性叛逆”在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还详细剖析了其多样化表现形式,如个性化翻译、误译、节译与编译等,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该概念的广泛普及,学界也开始对其潜在的伦理风险展开反思。学者王向远[16]敏锐地指出,必须严格区分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创造性叛逆”与纯粹损害原作艺术价值的“破坏性叛逆”,强调并非所有的偏离都具有正当性。对此,谢天振[17]在随后的学术商榷中做出了正面回应,澄清该概念本质上是对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的意义变异的“中性描述”,其核心目的在于客观揭示翻译规律,而非鼓励译者随意篡改原文。近年来的研究[18]也进一步呼吁,在肯定创造性价值的同时,译者仍需坚守对作者、文本与读者的底线责任。笔者认为,谢天振教授对该概念的澄清切中核心——将“创造性叛逆”界定为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的意义变异的中性描述,既肯定译者的适应性创造,又守住原作艺术底线,这种辩证性正是本研究选择该框架分析《檀香刑》英译本的关键依据。

经过学界的共同建构与自我修正,“创造性叛逆”已从一个带有争议的描述性词汇,蜕变为解析跨文化交际中意义重构机制的成熟理论范式。在本研究中,该理论将跳出单纯的译介学视域,与生态翻译学相融合,用以分析《檀香刑》英译本在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下,为实现文本生存与交际意图而进行的多维适应性选择与重构。

4. 语言维的创造性叛逆

语言维是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的首要维度,指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对源语与目标语的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与转换。这种转换并非简单的语言符号复刻,而是译者基于目标语的语言规范、文体特征与表达习惯,在词汇、句法等多语言层级上实现的动态适配,而这种为适配目标语生态做出的主动调适,本身就是译者对源语的创造性叛逆。

4.1. 词汇层面的适应性选择

词汇作为语言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生态翻译学语言维适应性转换的首要层面,译者需在源语词汇特征与目标语表达习惯间寻求动态平衡。汉语特色动作动词往往承载着独特的动作质感与叙事功能,译者常通过创造性叛逆实现词汇层面的适应性选择,以适配目标语的语言生态。

案例 1:

原文:慌忙包裹起来,掖到不见天的地方。

译文: He quickly rewrapped it and put it away.

“掖”是汉语中极具表现力的特色动作动词,语义指向隐秘、稳妥地藏匿物品,具备专属的动作指向性与表达质感。英语词汇体系中不存在与“掖”完全对应的精准动词,机械直译会造成译文生硬拗口,无法适配英语的词汇表达生态。葛浩文在语言维层面做出适应性选择,实施创造性叛逆:他舍弃“掖”的字

面形式与细腻动作内涵,采用英语通用动词短语“put it away”进行简化替换,仅保留“藏匿、收好”的核心叙事语义。这种以目标语词汇习惯为导向的主动调适,剥离了源语动词的形式特征,却让译文符合英语的动词使用规范,提升了文本的流畅度与可读性,是生态翻译学语言维词汇层面适应性转换的典型体现。

4.2. 句法层面的重构

句法层面的创造性叛逆是生态翻译学语言维适应性转换的核心表现之一。《檀香刑》的文本自带浓郁的乡土叙事特征,汉语原文多采用意合型流水短句,句式松散、语序灵活、无显性语法连接,仅靠语义串联语句;而英语是形合型语言,强调句式结构完整、逻辑关系显性化。葛浩文为适配英语的句法生态与读者阅读习惯,主动挣脱汉语原句的形式桎梏,对句式进行重组、整合与逻辑重构,这种以目标语句法规则为导向的适应性调适,构成了句法层面典型的创造性叛逆。

案例 2:

原文:院子里跪着一片嘴上没胡须的,都穿着驼色衣衫,头顶着黑色的圆帽子。偷盗鸟枪的小虫子,已经被绑在一根柱子上。这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文文静静的,乍一看是个大姑娘。

译文: in which a line of men with no whiskers on their faces and dressed in tan clothing with black skullcaps were kneeling in the dirt. Little Insect, the fowling piece thief, was already bound to a post. He was a good-looking youngster with delicate features, so daintily demure he could easily have passed for a girl.

原文是汉语典型的意合型流水短句,以零散短句堆叠完成场景铺陈与人物刻画,语序灵活松散、无显性语法连接与逻辑标记,仅依靠语义内在关联完成语句衔接。译文彻底突破源语流水句的句法形式桎梏,对原文句法结构进行系统性重构,将原文零散短句整合为含定语从句的复合句式,借助分词结构与逻辑衔接手段显化语句间的修饰、陈述关系,构建出结构严谨、逻辑明晰的英语形合句式。这种主动摆脱汉语原句形式、基于双语句法差异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是生态翻译学语言维层面典型的创造性叛逆。译者在完整保留原文场景信息与人物形象特征的基础上,遵循英语形合语言的表达规范,有效消除了汉语流水句在英语语境中的阅读障碍,使译文契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句法认知,实现了译文在目标语生态环境中的流畅传播与有效存活,充分彰显了句法层面适应性选择对文学翻译跨语言转换的核心价值。

5. 文化维的创造性叛逆

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聚焦于源语文化内涵的跨语言传递,其核心是通过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保留源语文化特质与适配目标语文化生态之间达成动态平衡。《檀香刑》以清末山东高密乡土社会为叙事底色,文本中蕴含着方言、习语、文化意象词等丰富的文化负载内容,这些元素既塑造了小说鲜明的地域文化标识,也为跨文化翻译带来了特定的挑战。

5.1. 方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市井气息与人物性格的核心载体,《檀香刑》通篇融入山东高密本土方言,自带浓郁的乡土质感与情感张力,是小说独特语言风格的重要组成。但中英语言文化差异显著,多数方言词无直接英语对应,成为跨文化翻译的典型障碍。葛浩文摒弃对方言的机械直译,即便针对同一个方言词,也会依据语境情感、人物心态与交际功能的差异,采用差异化翻译策略,在保留地域文化特质的同时适配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实现源语文化与目标语语境的动态平衡。

案例 3:

原文:他恁够了,提着两只水淋淋的红手,又坐回太师椅上。

译文: Once his self-indulgence had run its course, he took his red hands out of the water and returned to his chair without drying them off.

案例 4:

原文: 心里那叫恣。

译文: I smiled and struck a pose.

“恣”是山东高密极具代表性的核心方言词，本义为畅快、尽兴、得意，可随语境呈现贬义嘲讽与褒义张扬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色彩，是承载地域文化与人物情绪的方言词。针对同一方言词在不同语境中的表达功能，葛浩文采用了两种差异化的创造性叛逆策略，形成鲜明对比。在案例 3 的贬义语境中，原文用“恣够了”刻画赵甲用凉水泡手后的猥琐舒适，传递了眉娘的鄙夷与嘲讽，译者采用深度意译的叛逆手段，彻底舍弃“恣”的字面形式，以“self-indulgence had run its course”精准传递贬义内涵，贴合语境的批判色彩，消解方言的地域认知壁垒。在案例 4 的褒义语境中，原文用“心里那叫恣”表达了眉娘被众人瞩目时的得意与张扬，译者采用抽象情绪具象化转译的叛逆手段，将内心抽象的畅快情绪，转化为英语读者可直观感知的肢体动作“I smiled and struck a pose”，以行为表达还原人物的性格底气。两种策略虽形式不同，但均是译者在文化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深度意译聚焦语境情感的准确传递，具象化转译聚焦人物性格的鲜活保留，二者均突破了源语方言的形式桎梏，在适配英语读者认知习惯的同时，完整保留了方言的地域文化内涵与人物情感特质，是文化维下方言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典型样本，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依据语境动态调适的翻译智慧。

5.2. 习语

习语是语言长期积淀形成的固定表达，涵盖谚语、歇后语等类型，是民族文化与地域生活智慧的载体。《檀香刑》中的山东乡土习语风格直白粗粝，承载着浓厚的地域文化内涵。译者葛浩文采取以文化传递为核心的创造性叛逆：以直译保留源语文化核心意象，拒绝迎合目标文化的软化改写，在守护乡土文化特质的同时，实现习语在译语环境中的有效传播。

案例 5:

原文: 尔真是老鼠舔弄猫腚眼，大了胆了!

译文: Like the rat that licks the cat's anus, you are an audacious fool.

该句是高密乡土歇后语的典型代表，以“老鼠触犯天敌”的荒诞行为构建喻体，风格粗俗直白。原文语境中，咸丰帝以此民间话语斥责太监，以市井粗鄙解构宫廷神圣，承载着独特的地域叙事功能。英语文化虽包容直白表达，却对这类中式乡土禁忌化粗俗表述缺乏适配的文化接受语境，也难以感知其背后的民间叙事质感。译者采取了直译手段，完整保留了“老鼠舔猫腚眼”这一极具冲击力的核心意象，拒绝按照英语主流表达规范对粗俗内容进行美化、删减或替换为本土温和习语。这种处理是译者基于文化生态平衡做出的适应性选择，它以舍弃部分句法上的“归化流畅”为代价，通过坚守源语文化意象，避免了乡土文化内涵的耗损。这不仅让英语读者直观感知到中式民间习语的原始野性，也在目标语文化生态中植入了独特的异质文化因子，是文化维适应性转换的成功实践。

5.3. 文化意象词

文化意象词是承载特定民族历史习俗与审美观念的词汇，是地域文化特质在语言中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文化独特性。《檀香刑》以清末山东高密乡土社会为叙事背景，文本中包含大量传统称谓与物质文

化意象词，这类词汇的文化内涵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译者在处理时需直面文化传递与读者接受的双重挑战，在忠实原文文化特质与保障译文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采取了极具个性化的翻译策略。

案例 6:

原文：俺进了正房，看到公爹端坐在那张他从京城运回来的檀香木嵌金丝的雕龙太师椅上闭目养神。

译文：I walked inside, where my gongdieh was sitting in a sandalwood armchair made unique by a dragon inlaid with gold filaments; he'd had it sent over from the capital.

这段原文包含传统称谓、建筑空间、器物工艺文化三类典型的文化意象词，葛浩文针对不同意象的文化负载特征，采取个性化翻译策略，以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实施创造性叛逆，实现了源语文化特质与目标语认知生态的动态平衡。

针对传统称谓意象词“公爹”，译者采取音译保留的处理方式。“公爹”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儿媳对丈夫父亲的专属称谓，承载着乡土家庭伦理与地域称谓文化，英语文化中无完全对等的表达，若采用通用意译“father in law”，则会消解其特有的乡土标识性。译者直接音译为“gongdieh”，未对这一称谓进行归化改写，主动脱离了目标语的称谓表达习惯，以坚守源语文化的独特性，让英语读者感知到中国乡土称谓的文化特质，避免了文化内涵的同质化流失，是文化维层面典型的创造性叛逆。

针对器物文化意象词“檀香木嵌金丝的雕龙太师椅”，译者采取了简化策略。该词是中式传统器物文化的浓缩载体，太师椅是中国特有家具形制，象征着使用者的身份与权威。檀香木、嵌金丝、雕龙则分别承载着材质文化、传统工艺文化与皇权文化符号，整体文化内涵复杂，英语读者缺乏对应的器物文化认知。译文将其拆解重构，以通用词“armchair”替代太师椅，消解了形制认知壁垒；以“dragon inlaid with gold filaments”传递雕龙、嵌金丝的工艺特征；以“made unique”点明器物的特殊价值，替代原文隐含的等级象征。这种处理并非对文化意象的弱化，而是译者为契合目标语物质文化接受语境做出的创造性叛逆，既保留了器物的核心文化符号，又以英语读者可理解的方式传递了其文化价值，避免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

针对建筑空间意象词“正房”，译者同样采取了简化处理。虽然“正房”本是中国传统四合院建筑中的主房，承载着宗法家庭中地位与权威的文化内涵，是传统建筑文化与家庭伦理的体现，但在原文语境中，其核心功能仅在于点明场景方位，而非传递建筑文化细节。考虑到目标语读者难以感知此类特定的建筑文化信息，译者基于叙事功能的适应性选择，将其简化为“inside”，优先保障了叙事流畅性。这种为顺应目标语生态、平衡文化传递与读者接受而做出的调整，同样是文化维创造性叛逆的体现。

葛浩文对这段中文化意象词的处理，体现了守内核、调形式、保叙事的翻译准则：对核心文化标识采取音译坚守，对复杂器物文化意象以及非核心文化细节进行简化处理，既完整传递了源语的文化特质与叙事功能，又适配了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认知生态，是生态翻译学文化维适应性转换的典型实践。

6. 交际维的创造性叛逆

交际维的核心在于传递原文的交际意图，文学翻译不能只追求语言形式对等，还需还原文本语气、情感与言外之意，否则会弱化人物形象与叙事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译者往往不得不采取交际维的创造性叛逆，而这种叛逆往往以语言维与文化维的转换为基础。

案例 7:

原文：你那两根蒿不拉唧、花白夹杂、臭气哄哄的狗毛俺给你梳一次你就等于烧了八辈子高香修来的福分，你竟然如那吃腥嘴的猫儿，尝到了滋味的光棍，没完没了了。

译文：For the favor of having those few scraggly strands of washed-out, smelly dog hair combed out one time, you can

thank eight generations of your pious ancestors. But like a cat that's had a taste of fish, an old bachelor who's had a taste of the good life, you can't get enough.

这句话是眉娘对赵甲吩咐梳头后的内心独白，属于典型的乡土泼辣话语。原文借助“蔫不拉唧”等贬义词及“吃腥嘴的猫儿”等地域比喻，构建出嘲讽鄙夷的交际意图，在传达“贪得无厌”负面情绪的同时，也刻画了眉娘泼辣率直的形象。从交际维的视角审视，葛浩文的翻译并未拘泥于原文的乡土俗语形式，而是通过语用层面的创造性叛逆，精准还原了眉娘的讽刺意图。首先，在情感色彩上，译者将“蔫不拉唧”转化为“scraggly”，“臭气哄哄”转化为“smelly”，虽然舍弃了部分方言土味，但选用了英语中具有强烈贬低色彩的词汇，有效传达了眉娘对赵甲的厌恶感。其次，在比喻意象的跨文化重构上，面对“吃腥嘴的猫儿”和“尝到了滋味的光棍”这两个极具中国市井文化特色的比喻，葛浩文并未生硬直译，而是巧妙地将其转化为英语读者熟知的“a cat that's had a taste of fish”和“an old bachelor who's had a taste of the good life”。这种处理不仅消解了文化隔阂，更通过“猫尝鱼”和“老光棍尝好日子”的意象，完美复刻了原文中“贪得无厌、不知满足”的嘲讽意味，实现了语用功能的等效。最后，在句式节奏的重组上，译文通过“For the favor of...”与“But like...”的句式对比，以及“you can thank...”与“you can't get enough”的呼应，在英文语境中重构了一种类似顺口溜的嘲讽节奏。这种创造性叛逆不仅没有削弱原文的交际力度，反而让英语读者能够跨越语言障碍，深切感受到孙眉娘鲜明的人物特征，成功在目标语交际生态中重塑了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

7. 结语

创造性叛逆并非文学翻译中的“误译”，而是译者为了适配目标语生态、推动文本跨文化有效传播而做出的理性调整。在《檀香刑》英译本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并非随意篡改，而是基于目标语生态的理性策略：语言维通过词汇简化与句法重构弥合汉英差异，文化维以个性化翻译策略处理方言与意象，交际维则依托前两者的转换，重构了原文的语用等效与人物情感，三者协同实现了译文在目标语生态中的有效存活。因此，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中权衡文化传递、读者接受与交际效果后一种合理的策略选择，在文学翻译中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研究样本较为单一，仅以单部作品与单译本为分析对象，相关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同时以文本对比分析为主，未结合海外读者接受数据等实证材料佐证译文传播效果。后续研究可拓展至莫言其他乡土作品的多译本横向对比，也可补充实证视角，探讨方言改写策略与译文海外接受度的关联，为中国乡土文学外译的实践路径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王小花. 目的论视角下莫言小说英语翻译策略研究[J]. 名作欣赏, 2024(33): 21-23.
- [2] 杨四平. 移位生成与错位阐释: 莫言小说海外传播和接受中的中国形象建构[J]. 山东社会科学, 2026(2): 71-78.
- [3] 黄苗, 刘川鄂. 葛浩文翻译莫言小说方言时的读者意识[J]. 当代作家评论, 2025(1): 47-50.
- [4] 吕世生, 郭庆. 葛浩文中国文学翻译的两个共识及矛盾[J]. 中国翻译, 2025, 46(6): 80-85.
- [5] 胡作友, 彭九州. 葛浩文删改式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 中国文化研究, 2024(3): 160-169.
- [6] 单伟龙, 陈保红. 身份归因与翻译范式: 葛浩文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研究[J]. 上海翻译, 2025(6): 86-90.
- [7] 胡庚申.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性”[J]. 中国翻译, 2004(3): 12-18.
- [8] 陈延潼. 余光中: 高明“文字媒婆”、寂寞之译者——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文学重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22(6): 79-84.
- [9] 周韦, 宋彬彬.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儒林外史》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J]. 绥化学院学报, 2024, 44(9): 76-78.

-
- [10] 王静.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黄河流域生态文化国际传播研究[J]. 上海翻译, 2024(4): 46-49.
- [11] 杨春丽,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名胜简介英译与地方国际形象提升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32(4): 109-113.
- [12] 王畅, 杨玉晨.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 TCM 医院公示语英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24(4): 39-43.
- [13] 何思颖. 生态翻译学背景下皮革专业英语翻译教学方法研究——评《科技英语翻译教程》[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6): 132.
- [14] Escarpit, R. (1987)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5]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16] 王向远.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8(4): 1-8.
- [17] 谢天振. “创造性叛逆”: 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9(2): 4-13+141.
- [18] 曹明伦. 真正的译者绝不能当叛逆者——兼谈对英译汉合格译者的基本要求[J]. 中国翻译, 2022, 43(5): 172-177.